

#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风俗变革

## ——以断发放足为例

李 跃 乾

**摘 要:** 台湾变成日本殖民地后,以蓄发长袍和缠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风俗习惯不得不变革。了解世界潮流特别是祖国大陆改革情况的士绅(知识分子和绅商),积极推动断发放足运动,起到了领导作用。而总督府起初并不用公权力推行断发放足,只是到了想同化台湾人时,它才使用了公权力。

**关键词:** 社会风俗;台湾士绅;断发放足;同化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7)2-213-03

**作 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博士生;福建,厦门,361005

“台湾缠足习俗,原亦来自大陆。……嘉庆以后,海禁渐弛,内地人可携眷来台,而人口亦复增值,缠足随之而成风气。”“缠足妇女,以闽属为多,粤属绝少。”“漳泉妇女大都缠足,以纤小为美”。在台湾,男人主要穿长衫马褂、对襟衫、大陶衫;女人穿大陶衫,衫长过膝。

清朝的服饰文化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十九世纪末,蓄发长袍和缠足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迫切需要改革。大陆的断发易服和放足运动是由戊戌变法特别是辛亥革命推动的,是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的。大陆服饰改革的方向是学习西方列强。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其断发易服和放足运动有自己的特点:

### 一 日据初,总督府对社会风俗变革的消极态度

日据初,台湾总督府即发现缠足、清朝服饰是台人根深蒂固的习惯。日本舆论“标榜以严禁鸦片、断台人之辫发、解放妇女之缠足作为台湾统治上之三大主义,若不断行此政策,则虽然领有台湾,亦无用处。”

然而,台湾总督府却采取所谓渐禁政策和自发放足。其原因是:

第一,借保持旧风俗习惯来安抚台湾人民。1895年7月30日,民政局长水野遵致基隆支厅长伊集院彦吉的信表明了要暂时维持现状。“虽然吸食鸦片、蓄留辫发及妇女缠足等为本岛向来之弊风恶习,惟一时亦难以遽然改易。…对于上述习俗,希转知所属,不宜滥发表可能伤害人民感情的谈话。”随后总督府在决定施政方针时,认为若采取“放逐主义”将台人逐出岛外,或采“同化主义”将日本宪法强施于台湾,并明令禁止发辫缠足等台人风俗习惯,非但均将徒然造成各地的纷扰,且恐难以获致成效。加以征诸于数月间的经验,取缔辫发

缠足,只是更刺激台人,并无益于施政;况且即使保留发辫缠足,亦丝毫无碍于施政。乃决定暂采“放任主义”政策,不干涉台人风俗习惯。

1896年,二任总督桂太郎施政方针:“内地法规虽宜逐渐施之于台湾,然因人情风俗语言不同,若撤消彼此之区别,而绳之以同一法规,则不特难免彼此冲突,…故应随着地方行政之推行,调查各地人情风俗语言之异同,其法规之不适合者,以勒令或律令订定特殊规程,以期达成法规之目的。”当年8月,总督府对欲留台之台人所作的5点宣告中,表示“日本政府断无强使土民改风俗易旧惯之事,自应听尔等之便,即将来为日本之臣民愿改者则改,或仍喜于旧服辫发亦仍循其旧惯焉。”

同年12月,三任总督乃木希典的民政方针“本岛居民自祖先以来即奉为规范之旧惯故俗,……应予废除,固不必论;然而如辫发、缠足、衣帽等,则须在一定的限制下渐收防遏之效,其他良风美俗则应继续让其保持,以利施政。”

第二,1918年以前,总督府全力镇压台湾人民的武力反抗,忙于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在行政上,建立州厅市郡街庄各级警察组织,保甲制度。在经济上,调查自然资源,统一度量衡与币制,建设铁路公路等。“当前最迫切需要的首要工作就是开发台湾的资源”。

### 二 台湾地方士绅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据台湾学者吴文星研究,台湾士绅对断发易服和放足等社会风俗变革所起的作用是:新观念的建立与传播,组织社会团体以推动之等。

台湾士绅谋变革风俗的原因有二:首先,他们知道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才能救亡图存。其次,台湾的所谓“母国”由中国变成日本,要想到殖民政府里做公职人员,必须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学习日本文化。“在当时能穿着内地(指日本,引者注)服饰结婚,需具有相当的社会文化地位。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须透过穿上殖民母国传统服饰来表征,显示殖民时代殖民母国与被殖民国文化地位的不平等。”<sup>①</sup>

台湾总督府的官警、教师、医生等都有其工作制服。例如,1897年1月7日公布巡警制服;1899年2月18日公布总督府文官制服;1901年6月19日公布警察官制服;1907年4月30日公布铁路职员制服等。文官服规定,必须剪辫发,故公学校教师、官吏必须剪发。<sup>②</sup>

首开风气的是李春生。受总督桦山邀请,他带着孙子们于1896年2月27日到日本,由于穿长袍留辫子,为日人嘲笑

为“清国奴”。3月2日到东京西式旅馆,见日本人多改行西方礼俗,李春生感想“予素喜西制,尝慕改装效颦,以为便利,奈格于清俗,不肯权变为憾。今者,国既丧师敌款,身为弃地遗民,因是决意断辮改妆。当晚请旅馆主人介绍裁缝,订制西服。5天后衣服做好,“即立行剪辮礼”。<sup>③</sup>“诸孙儿视予改妆为荣,举皆乐从效尤,……自是虽知身非欧西族类,然英侠之气,勃然流露,已非昔时孱弱佝偻之比。”<sup>④</sup>

1898年2月1日,在日人所办的芝山崖学堂,首批毕业生柯秋洁、潘光储、潘光楷、潘光明、潘乃文、陈兆鸾等人断发,首开断发风气。<sup>⑤</sup>

除带头示范外,士绅还在各地组织解缠会、断发会、风俗改良会、同风会、矫风会等社会团体,推动断发易服和放足。由于一些士绅还是参事、区长、街长、庄长、保正、甲长等基层官吏,他们还利用保甲制度推行断发易服和放足。

下面分区简介断发易服和放足情况。

台北。1899年末,黄玉阶、李春生等40多人筹组台北天然足会。次年2月6日获得台北州府批准。<sup>⑥</sup>3月10日在大稻埕举行成立仪式,儿玉源太郎总督、后藤新平长官、村上义雄台北州知事等250人参加。会则:“(一)排除缠足之弊风,指导向文明改移风俗;(二)会员入会后所生女儿,如有不脱缠足之余习者,不与其家婚娶;(三)鼓舞会员向各地士商民户,劝奖解放缠足;…<sup>⑦</sup>该会维持费用靠会员和慈善捐款。

村上的贺词“兹矫正弊俗系属目前之急务,倘政府颁法布令,强制解缠,未尝不于端正风俗之道得于速收成效。然强而行之,不如盛行风教感孚众心,故今者设立此会岂非尽善尽美之良举哉。…若非在上流者躬行实践,势合力集,倡率风行,其矫正弊俗诚恐难以望其成。”<sup>⑧</sup>

台南绅士蔡国琳致贺词:“天然足会者,支那有识者流尝倡为是会,而国人牢不可破,排议者众,卒未实事奉行,寻至同盟败约,厥功未竟。”<sup>⑨</sup>

该会随即刊印会旨会规,广招会员,“革故鼎新,改除缠足以成天然”。<sup>⑩</sup>会员到3月中旬已有600多人。<sup>⑪</sup>台北州下各办务署积极鼓励各区长、保正招募会员。到1903年7月,计有正会员2270人,其中放足者199人,保持天然足者432人。<sup>⑫</sup>该会在彰化、台中、澎湖、基隆、桃园、深坑、新竹等地先后成立支部。但3年内、经费不足、成效不大。

该会发行《天然足会会报》,说明缠足违反人道、戕害身心、不便作息、有害卫生、违背自然及不合潮流等害处。<sup>⑬</sup>

黄玉阶等又于1910年2月11日在台北大稻埕主办断发会。<sup>⑭</sup>

1911年,台北厅另有参事洪以南之妻陈宇卿、艋舺区长黄应麟之妻施招等人,发起“解缠会”,号召妇女入会。3月之内,会员达1061人,其中,已放足及保持天足者631人。该会遂于8月14日假艋舺公学校举行成立大会。会长陈宇卿说,该会旨在顺天理而全人道,以革除数百年的缠足之风,为未来的妇女开一光明之途。<sup>⑮</sup>但该会影响不大,数月间缠足者减少有限,并仍有新缠者。

台南。1900年3月,参事许廷光、台南新报记者连雅堂等台南地区绅商名流筹组天足会。在“台南天然足会序”里,连雅堂指出“缠足之害论者多矣,而其大端不出于张香涛(之洞)、梁卓如(启超)之二序,一则谓其害人功,一则谓其拂天性。呜呼,斯二者其患更甚于洪水猛兽,而不一拯救之,是举

巾幅之妇皆为无告之罪人,……此不佞所以有提倡天然足会之举也。”<sup>⑯</sup>6月正式成立,会所在台南城内。由于经费困难,其活动收效有限。

1901年底以后,放足运动一度呈停滞状态。1903年,到日本大阪参加博览会的台湾绅商500多人。<sup>⑰</sup>目睹了进步的日本女子生活状况,他们纷纷呼吁重视女子教育及放足。基隆街长许梓桑于11月倡设天然足会,招募同志鼓吹放足。<sup>⑱</sup>台南士绅则采用新方法推行放足,即利用厅参事会议讨论放足问题,与会参事朝凤、吴子周、李学礼等认为,为彻底革除缠足陋习,应于保甲或农业组合规约中加入禁缠足条款,并严格执行。<sup>⑲</sup>9月15日,台南厅召开农业组合谘议会,讨论了放足问题,议决农业组合规约中附加禁缠足条款。吴道源等人乃拟定天然足会规约,分发给各街、庄长,其要点如下:

(一)本会设本部于台南市,设支部于台南厅下各街庄役场或保甲事务所。(二)会员女儿年六岁以上者不得缠足。(三)会员儿子年十岁以下者,今后不得娶缠足女子。(四)会员女儿若仍缠足者,处以罚金五到一百日圆。等等。上述条款得到总督府认可,一时其他各厅也纷纷仿效。<sup>⑳</sup>但推动结果不佳,一年后,放足人数仅四百余人。

直到1911年,台南厅乃用强制手段,以补劝导之不足。在保甲规约中规定,除了庶趾弯曲无法恢复外,未满20岁的缠足者均须解缠,对女儿绝不可缠足,违约者将受保甲处分之制裁,即由保正、甲长审查其行为轻重,科以100日圆以下之罚金。以期“使陈年问题,且不良习俗,渐至绝迹。”<sup>㉑</sup>之后,台南厅下的断发和放足都盛行。

台中。1913年,台中厅大甲区长朱丽决心去除蓄发恶习,捐赠学生帽奖励愿意剪辮的学童。大甲公学校校长金子政吉也倡导。当年年底全校学童400多全部剪发。1914年3月台中厅设立“风俗改良会”,由厅参事杜清、辜显荣、林献堂等人发起,各区长加入,积极推行断发放足。<sup>㉒</sup>1914年11月彰化成立“解缠足会”,由区长杨吉臣、参事吴德功、吴汝祥等人的夫人发起。<sup>㉓</sup>鹿港区街庄长王道器,劝诱奖励解放缠足。<sup>㉔</sup>

1914年12月,林献堂、吴鸾鸾等人的夫人在台中发起“解缠足会”,并率先放足。到翌年1月24日召开解缠大会时,会员数及放足数已达一千余人。<sup>㉕</sup>

宜兰解缠会,1912年1月8日起,由主要干部会同保正、医生等,挨家调查缠足女子,由医生检查能否解缠,能解缠者即登记为解缠足会会员,并赠送药水。因此不及一个月,市内放足者多达868人。<sup>㉖</sup>

### 三 总督府劝诱风俗变革的目的在于同化

总督府并不强制断发放足,只用学校和报刊劝诱,因而效果不彰。1895年9月总督府刊行“台湾开化良箴”,揭示台人宜戒之风俗习惯六项,其中分别强调缠足、鸦片、辮发三项戕害身心、有害卫生。<sup>㉗</sup>

1898年8月6日,台北暴风雨,房倒1390间,人死85,伤者无数,死伤者多系缠足妇女。总督府的《台湾日日新报》在8月10日的“灾余志感”栏目,呼吁妇女自觉缠足之非,而士绅名流宜身先唱率,并出组不缠足会以化导俗情。

士绅在各地组织改良风俗的团体后,《台湾日日新报》报道它们的活动。前文所述台北台南天足会等团体的活动,《台湾日日新报》都作了报道。特别是台北天然足会,在它筹组之

初,《台湾日日新报》把它比为“木铎”,“实如红十字事业之义例美风”。<sup>③</sup>

当时中国也兴起了断发放足热潮。1898年6月重庆天足会成立;1903年7月前署川督岑劝诫缠足;湖南巡抚赵中丞颁发劝戒足说;1902年4月,清廷禁止缠足,等等。利用台湾人民关注大陆的心理,《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惯习记事》等报刊随时报道苏、浙、闽、粤、湘、鄂等地中国维新人士倡组不缠足会的消息,转载重要的戒缠足言论和谕示,影响台人。<sup>④</sup>

《台湾日日新报》于1914年底举办“论缠足之弊害及其救济策”征文比赛,评出优秀论文44篇,自1915年1月1日到4月16日连载。它们论述了缠足之害:戕害身体、不卫生、行动不便、妨碍女子教育和男女平等、浪费人力资源、生育孱弱子女而有害强种。它们还探讨放足运动成效没有断发易服大之故,其中之一就是官民均抱持渐禁主义。<sup>⑤</sup>

公学校也鼓励断发放足。1900年,台北州下各公学校查明,全州女生448人,有360人缠足,欲放及已放足者23人。<sup>⑥</sup>其他各地学校也扮演类似角色。例如,1901年2月20日,基隆办务署指示辖内各公学校长奖励女学生放足。<sup>⑦</sup>

1902年《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第九册编有“缠足”课,指出缠足伤残身体等危害。<sup>⑧</sup>然而,由于此时女子受教育者甚少,故受影响而放足的女子也有限。

1911年2月11日,大稻埕公学校举行剪辮会,学童剪者30人,为台人剪发之始。<sup>⑨</sup>

1913年《公学校用国民读本》卷八编有《阿片与缠足》一课,指它们为台湾最大陋习。1914年之际,台北国语学校附属女学校110名学生,已经无人缠足。<sup>⑩</sup>

总督府借变革风俗习惯来实行同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影响深远。1950年代参加“台独”运动的钟谦顺回忆说,依日本教科书所说:中国是个老大之国,鸦片之国,缠足之国,打起仗来一定会败的国家,又是外患内忧无常的国家。<sup>⑪</sup>

#### 四 断发放足运动的结果

据当时户口调查,到1905年10月,全省有缠足800666人,占女子总人口的56.9%;如将未达缠足年龄五岁以上女子扣除,女子缠足的百分比为66.6%。其中闽族为最多,达68%,粤族不过1.5%而已。...此解放运动,虽行三、五年,以古来风习一时不易改移,故成效并不乐观,仅不过8694人而已。其对于缠足者之百分比率则不过1.09%而已。然各地方推行解放运动,有所成就,例如新竹厅为14.53%,成效最佳;番薯寮亦得12.6%,居其次;彰化放足者2291人,为数最多,但仅占2.58%;至于放足运动中心台北则仅256人,占0.26%;台南有912人,占1.47%。可见,五年放足运动成效甚微。<sup>⑫</sup>

断发易服也有阻力。很多人把旧服饰当成汉民族特征。“传以传统服饰,历用不改,盖数典而不忘其祖也。”<sup>⑬</sup>如板桥林家。“在剪辮子的前一天晚上,家人痛哭整个晚上,老妈子和丫头连同男仆也陪着东家哭到天亮。”<sup>⑭</sup>普通民众则多用便宜且结实的土布。日据初,日本布已充斥市场,但大家仍喜欢中国衣料。在台北,一般人的衣料是未经漂白染色的粗布。<sup>⑮</sup>还有少数读书人保留辮发是想考取清王朝的功名。

但是,1915年前后是断发放足运动的转折点。总督府强制台湾人断发放足。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剪除辮发,这对台人影响很大。总督府乃考虑利用公权力推行断发放足运动。另一方面,殖民统治日渐巩固。总督府大谈“内台一如”,高倡“内地延长主义”。蓄发缠足不仅被总督府视为陋习,且视之为同化的障碍。“放足运动力量之消长与总督府支持之强弱成正比,而断发不但是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sup>⑯</sup>1915年4月15日总督府通令各厅长将禁止缠足、辮发等事项附加在保甲制度中,并规定1915年6月15日为缠足蓄发最后期限。慑于日警的严峻,大部分老百姓断发易服。不愿剪发者,如鹿港秀才洪弃生,被日警在家里强行剪去。<sup>⑰</sup>

1915年6月17日在台北举行“始政20周年纪念台湾展览会”时,台湾总督府发动断发解缠奖励活动,响应者有几十万人,达到最高潮。<sup>⑱</sup>

到1910年代中期,基本上达到了普遍放足和断发易服的目标。日据中后期,台人穿西装,或日本的“国民服”,而与日人接近者亦多穿日人的“和服”。在服饰上台人日人已无差别了。

注:

⑫⑭⑯ 台省文献委员会:《台湾省通志稿》,捷幼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9、104、104、2页。

⑮⑰ 叶肃科:《日落台北城》,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3年9月版,第219、224、224页。

⑱⑲⑳㉑ 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正中书局1992年3月版,第249、258、255、284、248页。

总督府警务局:《日本统治下的民族运动》上卷,第741、647页。

井出季和太:《台湾治绩志》,第253、265页。

《台湾新报》第13号,明治29年8月20日。

马若孟著,陈其南、陈秋坤编译:《台湾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牧童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页。

①①《台湾史料研究》,1998年第11号,第79页。

①②③ 李春生:《东游六十四日随笔》,福州美华书局1896年版,第9、16页。

①④ 朱江淮口述:《朱江淮回忆录》上,朱江淮文教基金会2003年5月版,第444页。

①⑤⑥ 井出季和太著,郭辉编译:《日据下之台政》卷一,海峡学术2003年初版,第340、340页。

①⑦⑧⑨⑩《台湾日日新报》,第566号,明治33年3月24日;第541号,明治33年2月22日;第548号,明治33年3月2日。

①⑪⑫《台湾惯习记事》,第3卷第12号,1903年12月;第4卷第2号,1904年2月。

①⑬ 台省文献委员会:《台湾近代史》社会篇,1995年6月版,第78页。

①⑭《台湾新报》,第4033号,明治44年8月14日。

①⑮《台湾日日新报》,第574号,明治33年4月3日。

①⑯《台湾教育杂志》,第18号第21页,1903年9月。

①⑰ 林进发:《台湾官绅年鉴》,民众公论社1933年版,第123页。

①⑱⑲⑳《台湾新报》,第1595号,明治36年8月23日;第1619号,明治36年9月20日;第3915号,明治44年5月18日。

①㉑ 朱江淮口述:《朱丽传》,朱江淮文教基金会2004年9月初版,第144、145页。

(下转229页)

的行政处罚仅限于没收船货或课以罚款等经济制裁,并未因情节严重构成走私罪而追究其刑事责任。<sup>③</sup>总税务司曾建议于刑法内增加走私罪条款,但国民政府色厉内荏,没有作出对走私犯罚禁并处的严厉规定,仅仅规定了故意收买偷漏关税货物者除按照《海关缉私条例》没收货物外,应依照《刑法》之赃物罪科刑。由于没有规定对走私人犯处以刑事处罚,其结果是,一旦走私分子受到查处,走私分子只是蒙受一定的财产损失,随后仍可以自由之身继续进行走私。

在全面抗战时期,由于中国海关缉私防线被日寇破坏殆尽,《海关缉私条例》基本上被国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战时法规所代替。战后,为了弥补《海关缉私条例》不够严密的缺陷,国民政府于1948年3月11日公布《惩治走私条例》,规定走私和武装拘捕为触犯刑法行为,得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但因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严刑峻法对走私惯犯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更何况是对特权阶层走私。显然,对于牵动统治阶级上层、涉及全社会的走私问题,决不是简单地靠增加缉私人员、完善缉私装备和法律制度、强化海关缉私力量之类方法所能奏效的。总之,国民政府吏治的腐败是陷民国时期中国海关缉私于绝境的根本原因。

注:

陈筱兵:《海峡两岸海关缉私法律法规之比较研究——兼谈我国制定海关缉私条例及完善海关法有关内容的几点设想》,载《海关研究》1998年第4期;翁重德:《台湾海关对虚报行为的处罚:台湾海关缉私条例第37条之适用》,载《现代台湾研究》1996年第16期。

[韩]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1933—1937)》,台北:国史馆印行,1997年;杨家余:《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载《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连心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海关缉私工作的整顿与加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3期;连心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海关缉私工作述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海关总税务司署统计科编:《总税务司通令》(第2辑)第4913号附件,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印行,1940年。

陆允昌编著:《苏州洋关史料(1896—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5页。

[日]高柳松一郎著,李达译:《中国关税制度论》,商务印书

馆1927年版,第120—121页。

财政部关务署编:《海关罚则评议会章则议案汇编》,南京:编者刊,1936年。

[英]莱特著,姚曾虞译:《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67页。

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2页。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191、203页。

①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第77—81页。

②国民政府主计部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南京:中国文化事业公司,1948年,第248页。

③广东省档案馆:《代理总税务司罗福德对近代中国海关缉私情形的回顾》,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

④邓开颂等:《粤澳关系史》,北京:中国书店,1999年,第428页。

⑤[韩]孙准植:《战前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1933—1937)》,台北:国史馆印行,1997年,第573页。

⑥《会讯章程(1932.7.—1932.8.)》,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档案号:六七九/20346,二档馆藏。

⑦李权时:《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22—425页。

⑧《海关罚则评议会的一般问题(1934—1949)》,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档案号:六七九/14756,二档馆藏。

⑨《商人不服海关防止公路内河私运稽查处的处分向海关罚则评议会提出申诉》,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档案号:六七九/14763,二档馆藏。

⑩财政部关务署编:《十年来之关税》,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印,1943年,第9页。

⑪《海关缉私条例执行情况的报告(1936.1.—1940.8.)》,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档案号:六七九/27719,二档馆藏。

⑫财政部缉私署编:《十年来之缉私》,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年,第10—11页。

⑬《关于日本策动华北走私情况档案史料选》,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

⑭《各关对缉私条例执行情况的报告(1935.4.—1949.5.)》,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档案号:六七九/27720,二档馆藏。

⑮《有关海关缉私条例的问题》,海关总税务司署档案,档案号:六七九/27723,二档馆藏。

(责任编辑:唐昌福)

(上接 215页)

③③《台湾新报》,第5188号,大正3年11月27日。

③④吴文星:《鹿港志人物篇》,鹿港镇公所2000年6月版,第88页。

③⑤③⑥《台湾新报》,第5246号,大正4年1月26日;第4204号,明治45年2月11日。

③⑦连温卿:《再就台湾文化的特质而言》,《台北文物》,第3卷3期,104页。

③⑧④①《台湾日日新报》,第513号,明治33年1月19日;第611号,明治33年5月18日。

③⑨《台湾新报》,第543号,明治33年2月24日。

④④台湾总督府编:《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九),台北1912年出版,第32页。

④⑤《台湾新报》,第5159号,大正3年12月4日。

④⑥锺谦顺:《炼狱余生录》,前卫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40页。

④⑦陈三井、许雪姬:《林衡道先生访问纪录》,中研院近代史所1992年12月,第49页。

④⑧赖佳慧:《在野台湾人》,远流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责任编辑:唐昌福)